

【农业经济】

# 成员异质性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非“民主治理”

——以苏北地区为例

陈东平,任芃兴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摘 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其内部治理机制已背离合作金融所倡导的“民主治理”模式,结合已有的农村金融改革经验不禁反思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民主治理”模式为何屡屡难以实现。受相关理论和研究启发,本文首先从成员异质性视角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非“民主治理”的原因予以探讨,并以江苏省盐城市36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组织成员异质性增大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逐渐偏离“民主治理”模式。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组织异质性的成员结构可能来源于农村圈层结构改变的社会变迁过程,据此,相关农村金融政策应该明确方向,并辅以相应措施。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异质性;民主治理;农村社会变迁;农村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4-0045-09

## 一、引言

大量合作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合作金融组织对于缓解农村金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sup>[1-2]</sup>事实上,从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信用社和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始终没有绕开合作金融的话题,可以看出,政府寄希望于通过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来增加农村有效金融供给。

合作金融组织的特征是自愿性、互助性、民主管理和非赢利性<sup>[3]</sup>,其根本目标是实现社员融资互助,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合作金融组织社员参与的自愿性和民主治理为前提<sup>[4]</sup>。在存在明显的政府干预条件下,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均未实现真正的社员入社自愿和民主治理,从而政府强制性实施的合作金融制度安排难以实现真正的合作。<sup>[5-8]</sup>

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步伐并未因上一轮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改革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

闭而停止。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大量涌现。与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过程更多体现了农户的自发性和主体性。遵循入社自愿原则,政府作为外部因素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过程中并未扮演主导性角色,然而,这样一种内生于农村金融需求的组织,其内部治理机制却同样背离合作金融原则所倡导的“民主治理”模式,这表明将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终究未能建立的原因归结为政府主导的既有研究结论无法解释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难以实现“民主治理”模式的原因,这使得本文需要进一步探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缘何难以实现“民主治理”?当前针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旨在实现合作金融目标的相关农村金融政策应作何调整?回答以上问题对于完善农村金融政策,进而缓解农村金融抑制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自发设立、成员入社自愿的金融组织,探究其内部治理问题可以忽略政府干预因素,而着重对组织内部“人”之间关系形成

收稿日期:2013-0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演化过程中风险累积的识别与抑制研究”(71273138);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发育机理与响应条件研究”(20110097110008)

作者简介:陈东平,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任芃兴,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及制度金融。

的社会基础进行分析。遵循上述思路的相关研究,一是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的缺失使得合作金融组织缺乏合作基础,民主治理难以实现。<sup>[9]</sup>二是强调道德约束、社会联系是合作金融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人合”性质的金融组织,“人合”的基础是“人和”,没有“人和”基础的合作金融极容易发生变异,甚至倒社、倒会。<sup>[10]</sup>如上世纪80年代台湾大规模的倒会风潮,经济发展致使人员流动性增强,传统社会的联系日益脆弱,道德约束力变差等合会大量倒闭的原因。<sup>[11]</sup>同时,突破原有的地缘、血缘联系及经济的发展唤醒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也导致合作金融组织成员利益的分歧。<sup>[12]</sup>三是组织内部成员所拥有的要素重构成成本的差异性会对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产生影响。<sup>[13]</sup>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缺失并不能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难以实现“民主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大量存在过的合会组织并不都是建立在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众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也存在偏离“民主治理”的现象<sup>[14]</sup>,合作经济的缺失与合作金融的缺失可能具有共同的原因,强调合作经济缺失是合作金融组织难以实现民主治理的原因实则没有解释其真正的原因。而农村社会“道德”“诚信”等水平的下降、人情关系的疏远或是个人追求财富意识的强烈等因素主要在解释组织倒闭的原因,而现实中的大多“合作金融”组织只是发生了“变异”,即使倒闭又会有新的组织出现,这是以上研究结论很难解释的。并且,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本质上是农户间的一种融资形式,组织的存在便是基于个体对“经济财富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道德”水平的下滑、人情的疏远及对财富的追逐也都是个体“经济理性”的表现,组织“变异”是不能简单地通过个体“经济理性”解释的。从成员要素重构成成本差异视角探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权力形成的基础具有启发性,但是研究仅讨论了资金和人力资本要素,忽略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缺乏对要素重构成成本差异形成原因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结论的实证检验,本文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组织稀缺性要素的成员异质性对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尝试进一步讨论成员异质性形成的根源,探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非“民主治理”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 二、分析框架

契约理论认为经济组织本身可以理解各个要素所有者自愿结成的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确立涉及到契约的形成过程,契约是交易双方经过“谈判而达成的协议”,契约权力安排与谈判双方的相对“谈判势力”有关,而决定和影响要素所有者契约形成过程中的谈判势力大小的“关键条件”或“主要因素”是其所拥有的各种要素间的相对稀缺程度。<sup>[15]</sup>契约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结论适用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模式问题的研究。

本文将内部治理模式从内部控制权分布和内部监督效力两个维度进行界定。内部控制权越集中于某一“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对强势利益集团的监督效力越弱,组织的治理模式越倾向于非“民主治理”;如果内部控制权在不同利益集团越分散,利益集团间实现监督效力越强,组织的治理模式越倾向于“民主管理”。

拥有相对稀缺要素的经济主体,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越高,其具有的“谈判势力”越强;而那些拥有相对充裕要素的经济主体,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越高,其具有的“谈判势力”越弱。在组织形成的“谈判”过程中,经济主体地位同样由其所拥有的要素稀缺程度所决定,所拥有的要素越稀缺,其“谈判势力”越大,所拥有的组织控制权越大;经济主体所拥有的要素越“充裕”,其拥有的控制权越小。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员均拥有组织的稀缺性要素: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但不同社员所拥有的要素稀缺性存在差异,要素稀缺性既体现为“量”的差异性<sup>[15]</sup>,又体现为该群体内部“合作”的程度<sup>①</sup>;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存在拥有显著差异的要素稀缺性的两个群体——组织的发

① 要素的稀缺性仅仅考虑“量”是不够的,根据奥尔森(1995)对利益集团的分析,小利益集团人数较少,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较低,更倾向于“合作”,而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因存在“搭便车”导致“合作”难以发生。因此,普通社员之间相对于核心社员更难实现“合作”,任何单一普通社员的要素退出组织,可以很容易从市场获取新的普通社员进行补充。而核心社员之间更易结成“联盟”,其可以实现稀缺要素的联合退出,从而形成可信的威胁,组织要从市场获取替代“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所拥有的稀缺要素要比“人数较少”利益集团的稀缺性要素成本更低。因此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的不同社员群体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既要考虑要素“量”的差异性又要考虑“合作”的可能性,这是本文对黄桂田、李正全(2003)要素稀缺性概念的进一步修正。

起人和组织成立后加入组织的社员,本文将组织的发起人视为组织的核心社员,将组织成立后加入组织的社员视为组织的普通社员。某种社员群体所拥有的要素稀缺性越高,其拥有的组织控制权可能越大;社员群体所拥有的要素稀缺性越低,其拥有的组织控制权可能越小。关于监督效力的研究本文仅研究普通社员和核心社员之间的监督关系,鉴于调查过程中发现核心社员在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普通社员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因此监督关系应该是普通社员对核心社员的监督。核心社员具有相对较高的“谈判势力”,核心社员为通过控制权的实施以保障自身利益可能通过降低普通社员对其监督效力予以实现,从而成员异质性越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监督效力可能越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成员异质性越大,核心社员控制权越大,组织越倾向于非“民主治理”模式;成员异质性越小,核心社员控制权越小,组织越倾向于“民主治理”模式。

假说二: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成员异质性越大,普通社员对核心社员监督机制越无效,组织越倾向于非“民主治理”模式;成员异质性越小,普通社员对核心社员监督机制越有效,组织越倾向于“民主治理”模式。

###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 1. 变量选择

(1)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控制权分布与监督机制有效性

假设普通社员和核心社员相互独立,不存在“合谋”,理事会成员和社员代表的实际构成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便可反映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理事会成员中核心社员比例<sup>①</sup>可以度量核心社员在理事会中的控制权,社员代表中核心社员比例可以度量核心社员在社员代表中的控制权;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可用监事会成员中核心社员比例进行度量。

(2)成员异质性变量

成员异质性在考虑上述资本差异的同时还要考虑“合作”程度的差异。合作程度与成员数量成反向关系。<sup>[16]</sup>基于此,本文用各群体所拥有的稀缺性要素量与合作程度之比的差额度量成员异质性,主要体现为资金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差异、政治资本的差异和在当地声望的差异,分别用

$hetero^{cur}$ 、 $hetero^{hum}$ 、 $hetero^{pol}$ 和 $hetero^{rep}$ 表示。

$$hetero^{cur} = \frac{capital_1^{cur}}{n_1} - \frac{capital_2^{cur}}{n_2} \tag{1}$$

$$hetero^{hum} = \frac{capital_1^{hum}}{n_1} - \frac{capital_2^{hum}}{n_2} \tag{2}$$

$$hetero^{pol} = \frac{capital_1^{pol}}{n_1} - \frac{capital_2^{pol}}{n_2} \tag{3}$$

$$hetero^{rep} = \frac{capital_1^{rep}}{n_1} - \frac{capital_2^{rep}}{n_2} \tag{4}$$

$capital_1^{cur}$ 、 $capital_1^{hum}$ 、 $capital_1^{pol}$ 、 $capital_1^{rep}$ 分别表示组织中核心社员拥有的资金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声望的总和, $n_1$ 表示核心社员规模; $capital_2^{cur}$ 、 $capital_2^{hum}$ 、 $capital_2^{pol}$ 、 $capital_2^{rep}$ 分别表示组织中普通社员所拥有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和声望的总合, $n_2$ 表示普通社员规模。其中货币资本用股权份额表示,人力资本用社员群体参与过某类组织经营管理工作的人数表示,政治资本用社员群体中在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曾任职或其近亲属曾任职的人数表示,声誉用社员群体中个人被邀请参与当地婚丧嫁娶主持及民间纠纷调解等工作的年总次数。

(3)其他控制变量

成员异质性对治理机制影响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员规模、存续年限等。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员规模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存续年限,用 $Scale$ 和 $Year$ 表示;除以上因素外还有其他影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控制权分布及监督效力且对单个个体而言恒定不变的因素,诸如地区因素等,该类因素用 $a_i$ 表示, $a_i$ 的引入能够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其他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扰动性因素 $\varepsilon_{it}$ 。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实地调研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sup>②</sup>位于苏北盐城市3个县,即滨海县、射阳县和响水县,通过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取三县36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2009年和2011年样本数据。本文之所以选择以上3县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样本

① 理事会对有关事项的决议主要凭借持各种意见的人数多少予以表决,而无关股金或其他资本的多少,因此本文用理事会中社员群体的人数量其相应的控制权;这种度量方法同样适用于社员代表控制权和内部监督效力的度量。

② 如前所述,本文所研究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较少受到外部监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而非银监机关管辖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该类组织归当地农办管理,受到的外部监管较弱,组织经营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较强。



主要基于苏北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大部分分布在盐城市,盐城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又主要集中于滨海、射阳、响水等县。

本文所使用的是 2009 年和 2011 年江苏 3 县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有关成员异质性、内部治理的面板数据。为了更为准确、科学地测度成员异质性对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本文综合比较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并予以审慎选

择。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常常涉及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但由于两时期面板数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所以无需进行平稳性检验。

3. 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需要对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以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现象。本文采用 SPSS 18.0 对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控制权分布及监督效力影响因素 *Pearson* 相关系数

	<i>hetero<sup>cur</sup></i>	<i>hetero<sup>hum</sup></i>	<i>hetero<sup>pol</sup></i>	<i>hetero<sup>rep</sup></i>	<i>Scale</i>	<i>Year</i>
<i>hetero<sup>cur</sup></i>	1.00 (0.00)	-0.23 * (0.07)	-0.25 (0.43)	-0.11 (0.38)	-0.21 (0.93)	-0.32 * * * (0.09)
<i>hetero<sup>hum</sup></i>	-0.23 * (0.07)	1.00 (0.0)	-0.08 (0.2)	-0.12 (0.36)	0.21 * (0.09)	0.14 (0.27)
<i>hetero<sup>pol</sup></i>	-0.25 (0.43)	0.08 (0.52)	1.00 (0.00)	0.06 (0.65)	0.01 (0.94)	0.10 (0.46)
<i>hetero<sup>rep</sup></i>	0.11 (0.38)	-0.12 (0.36)	0.06 (0.65)	1.00 (0.00)	-0.05 (0.71)	-0.05 (0.67)
<i>Scale</i>	-0.21 (0.93)	0.21 * (0.09)	0.01 (0.94)	-0.05 (0.71)	1.00 (0.00)	0.30 * * * (0.00)
<i>Year</i>	-0.32 * * * (0.01)	0.14 (0.27)	0.10 (0.46)	-0.05 (0.67)	0.30 * * * (0.00)	1.00 (0.00)

注:\*\*\*、\*\*、\*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1 可以看出,资金资本差异<sup>①</sup>与人力资本差异和互助社存续年限分别在 10%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并不高;成员人力资本差异与互助社的人数规模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也仅为 0.211;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立年份与互助社的人数规模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程度也不够高,这可能因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人员规模除与存续时间外,同时可能受制于当地的人口、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等因素;因此,虽然某些主要分析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的程度很小,不足以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上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1) 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核心社员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① 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核心社员在理事会中控制权的影响研究。

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以验证成员异质性对核心社员在理事会中控制权的影响。

$$\begin{aligned} Corate = & \beta_0^c + \beta_{1i}^c hetero_{it}^{cur} + \beta_{2i}^c hetero_{it}^{hum} + \\ & \beta_{3i}^c hetero_{it}^{pol} + \beta_{4i}^c hetero_{it}^{rep} + \beta_{5i}^c Scale_{it} \\ & + \beta_{6i}^c Year_{it} + a_i^c + \varepsilon_{it}^c \end{aligned} \tag{5}$$

上式中 *Corate* 表示理事会中核心社员人数比

例,运用 *Stata* 11.0 对上述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同时经过异方差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存在显著异方差。

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资金资本差异及声望水平差异对核心社员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理事会中控制权大小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前文假说。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差异对核心社员的控制权并没有显著影响。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资金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立、运作的重要基础,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起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资金资本量,并且资金资本一旦被投入到互助社中便对其长期经营过程发挥作用,因此投入更多物质资本的群体将拥有组织更多控制权,这与本文假说一致。

① 这里的差异指核心社员相对于普通社员的差异,即核心社员比普通社员多多少,如果核心社员资本量少于普通社员,差异为负值。下文中涉及到成员在各种资本上的差异均表示类似含义。

表 2 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理事会控制权分布的影响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及检验统计值	混合 OLS 回归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hetero^{cur}$	1. 87	0. 98	0. 33	1. 51 *	1. 76	0. 08	-0. 40	-0. 37	0. 71
$hetero^{hum}$	0. 12	0. 91	0. 37	0. 01	0. 16	0. 88	0. 013	0. 17	0. 86
$hetero^{pol}$	0. 12	1. 13	0. 26	-0. 03	-0. 18	0. 86	0. 05	0. 42	0. 67
$hetero^{rep}$	0. 04 * *	2. 37	0. 02	0. 02 *	1. 83	0. 07	-0. 003	-0. 30	0. 76
$Scale$	-0. 001	-0. 22	0. 82	0. 002	0. 78	0. 44	0. 002	0. 86	0. 39
$Year$	-0. 01	-0. 49	0. 62	-0. 01	-0. 77	0. 45	-0. 008	-1. 13	0. 26
常数项	0. 87 * * *	4. 18	0. 0	0. 82 * * *	8. 49	0. 00	0. 79 * * *	8. 07	0. 00
$R^2$	0. 14			0. 15			0. 09		
$F$ 统计量	132. 62								
$P$ 值	0. 00								
Hausman 检验							21. 20		
$P$ 值							0. 00		

注:\*\*\*、\*\*、\*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报告的  $R^2$  均为组间估计结果。

声望水平差异对核心社员在理事会中控制权大小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非正规金融”的性质。对此解释,一是在我国农村,道德声望在社会事务处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声望高的人无疑获取一种无形的“权力”,由道德声望高的人群管理互助社经营能够降低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交易执行更为高效;二是道德声望高的人管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经营更能够防止贷款违约现象的发生,社员一旦违约不仅面临遭受互助社内部的惩罚,同时会遭受互助社外由经营管理人员参与、组织的事务过程中的惩罚,社员的违约成本更高;三是由道德声望高的人参与经营管理更有利于互助社的规模扩张,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农户入社及在互助社中进行借贷交易大都基于对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信任在非正规金融交易中占据重要作用。

核心社员人力资本差异和政治资本差异对核心社员的控制权大小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因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过程需要与其他组织不同的经营管理经验,不同的经营管理经验之间不可以“移植”,因此导致组织管理工作经历的差异性没有体现为控制权大小的差异。从互助社成立程序来看,政治资本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立之初发挥重要作用,但因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立之后的经营过程具有较高的自主性,相关部门仅对互助社经营违规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政治资本并不必然影响其长期生产经营过程,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大多为互助社成立数年之后的数据,政治资本对核心社员在理事会中控制权大小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弱化”。

②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核心社

员在社员代表中控制权的影响研究。

社员代表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民主化”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银监会 2007 年下发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示范章程》的“第五章组织机构”,社员代表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社员代表大会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权力机构。社员代表中核心社员的比例视为核心社员在社员代表中控制权大小的度量,比例越高,权力越高;比例越低,权力越低。基于样本数据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begin{aligned} Recorate = & \beta_0^R + \beta_{1u}^R hetero_{iu}^{cur} + \beta_{2u}^R hetero_{iu}^{hum} + \\ & \beta_{3u}^R hetero_{iu}^{pol} + \beta_{4u}^R hetero_{iu}^{rep} + \beta_{5u}^R Scale_{iu} + \beta_{6u}^R Year_{iu} + a_i^R \\ & + \varepsilon_{iu}^R \end{aligned}$$

(6)

其中  $Recorate$  表示社员代表中核心社员的比例。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知,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表明采用随机效应可得到系数更为一致的估计。经检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存在显著异方差。

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仅有成员政治资本差异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核心社员在社员代表中的控制权有正的影响。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发现,社员代表一般由村会计、村主任或者村支书兼任。关于社员代表为什么偏好于村干部或政府人员可能与社员代表选举产生的程序相关,虽然本文并未对社员代表选举的程序进行深入研究,但根据对普通社员的访谈结果可以发现,普通社员对其社员代表并不熟悉,因此社员代表选举的公平性值得怀疑。而关于社员代表的产生程序可能欠缺公平性的原因,本文猜测一是可能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主管部门(如农工办)监督欠缺有关;二是社员对自身权利的模糊,调研过程中发现

很多社员根本不了解政策要求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实行民主化管理的规定,并且在农户社员心中村干部“理所当然”可以“代表”他们,从而简化社员代表的民主选举程序;三是村干部在区域内具有较其

他人员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互助社经营人员通过村干部可以了解区域内社员相关信息,这便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经营业务的开展,以上可能是大量村干部担任社员代表的原因。

表 3 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社员代表控制权分布的影响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及检验统计值	混合 OLS 回归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i>Copshare</i>	3. 55	1. 60	0. 12	5. 02	1. 02	0. 32	3. 61	1. 42	0. 15
<i>Cophcapital</i>	0. 07	0. 46	0. 65	0. 09	0. 18	0. 86	0. 08	0. 45	0. 66
<i>Coppolitic</i>	0. 33 ***	2. 59	0. 01	0. 49	0. 55	0. 59	0. 30 *	1. 85	0. 06
<i>Coprepu</i>	-0. 005	-0. 27	0. 79	0. 032	0. 47	0. 65	-0. 01	-0. 31	0. 75
<i>Scale</i>	-0. 003	-0. 50	0. 62	-0. 01	-0. 20	0. 85	-0. 00	-0. 38	0. 70
<i>Year</i>	0. 03	0. 82	0. 42	0. 041	0. 90	0. 38	0. 04	1. 47	0. 14
常数项	-0. 17	-0. 70	0. 48	-0. 43	-0. 76	0. 45	-0. 22	-0. 84	0. 40
<i>R</i> <sup>2</sup>	0. 13			0. 10			0. 12		
<i>F</i> 统计量	4. 91								
<i>P</i> 值	0. 001								
<i>Hausman</i> 检验							0. 68		
<i>P</i> 值							1. 00		

注:\*\*\*、\*\*、\*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报告的 *R*<sup>2</sup> 均为组间估计结果。

资金资本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和声望水平差异并没有对核心社员在社员代表中的控制权大小产生影响,这可能因为拥有较多的资金资本、较多人力资本或是较高声望水平的社员并不被认为可以代表普通社员的“权利”,农村长期形成的“官员崇拜”使广大普通社员忽视其他资本在社员代表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人员也看重社员代表的政治资本而忽视其他资本对信息传递的作用;并且监管部门未对社员代表选取程序进行有效监控,这使得其他种类的资本对社员代表中控制权分布的作用被忽视。

(2)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监督效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表 4 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监督效力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及检验统计值	混合 OLS 回归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i>Copshare</i>	2. 15	0. 80	0. 43	0. 26	0. 08	0. 94	1. 52	0. 64	0. 53
<i>Cophcapital</i>	0. 06	0. 30	0. 76	0. 11	0. 38	0. 71	0. 09	0. 46	0. 65
<i>Coppolitic</i>	0. 29 **	1. 92	0. 06	-0. 47	-0. 80	0. 43	0. 21	1. 11	0. 27
<i>Coprepu</i>	0. 004	0. 16	0. 87	0. 02	0. 44	0. 66	-0. 02	-0. 74	0. 50
<i>Scale</i>	0. 01	0. 75	0. 46	0. 00	0. 03	0. 97	0. 002	0. 31	0. 76
<i>Year</i>	0. 06	1. 49	0. 14	0. 02	0. 81	0. 43	0. 03	1. 19	0. 24
常数项	0. 07	0. 25	0. 80	0. 57	1. 56	0. 13	0. 30	1. 20	0. 23
<i>R</i> <sup>2</sup>	0. 14			0. 13			0. 10		
<i>F</i> 统计量	17. 63								
<i>P</i> 值	0. 00								
<i>Hausman</i> 检验							0. 58		
<i>P</i> 值							1. 00		

注:\*\*\*、\*\*、\*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报告的 *R*<sup>2</sup> 均为组间估计结果。



如前所述,表中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表明随机效应可以得到偏误较小的一致估计量,且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存在显著异方差。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成员异质性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监督效力没有影响,成员异质性四个变量联合检验的统计量  $\chi^2(4)=1.80$ ,  $P$  值  $=0.77$ ,即成员异质性4个变量对内部监督效力联合影响不显著。这与前文的假说并不一致。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本身原因,被调研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监事会中核心社员的比例普遍偏高,不同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之间差异不大,这使得回归结果不足以说明成员异质性对监督效力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监事会并未充分发挥有效监督作用,监事会成员的安排更多是为满足《章程》的规定,这使得成员异质性与监事会成员安排不存在紧密关系。

#### 四、结论及进一步讨论

依据实证研究结果,成员异质性的扩大将导致组织内部控制权向核心社员集中,普通社员对核心社员监督效力变弱,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民主管理”模式难以实现,合作制的基础缺乏。然而组织的成员异质性是否将扩大?本文从农村社会变迁视角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生产上的分工体系、经济收入分化导致农村社会的分层现象。经济上的分化影响农户社会关系上的分化,由此形成农户之间具有差异等级的人际圈子。农村社会无论在纵向结合还是在横向结合方面都存在着实利化倾向,财富标准成为村庄社会的主导性规则并对村民人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情往来中最重要的不是亲缘关系的远近而是彼此在工作和事业中的地位。<sup>[17-18]</sup> 富有的农户以个体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资源给他们带来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时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也为他们“乐善好施”奠定基础,于是经济资源还可以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声望,甚至可以谋求诸如“村长”“村支书”等“政治”资源。而普通农户因为往往处于分工体系的下层,他们缺乏建构社会关系的成本,其具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及声望较少。这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声望表现一致的分层现象的后果是富有的农户和普通农户间缺乏多种利益交易的基础,进而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互助”<sup>①</sup>;并且,富有农户

较普通农户更有能力去建立农村金融组织。

分工体系、经济收入分化也会导致农户“圈子”的变化。富有的农户更有能力去扩展自己的“社会圈”,其圈子可能越来越大;普通农户仅有同等层次并且存在生产上的紧密合作或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农户是他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他们的人际圈子较小,不同农户的圈子间可能缺乏联系,该层由多个相互孤立的圈子构成,并且随着分工体系的延伸,处于分工底层的农户的圈子越来越小,圈子的缩小使得普通农户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那些具有融资需求的社员群体未成立互助性的金融组织而选择加入已经偏离合作金融原则的金融组织。

农村社会变迁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产生异质性的成员结构的根源,社会变迁的结果是富有农户和普通农户间不可能实现“互助”,资源的限制以及交易成本的上升使得普通农户群体自身无力成立适合自身融资需求的互助性金融组织,于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必然采用由富有的农户发起进而由普通农户选择加入的模式成立,异质性的成员结构在组织成立之初便已形成,这必然导致组织的控制权向核心社员的集中以及监督机制的无效。

随着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农村分工体系将进一步细化,经济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实利化倾向会更为明显,从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员异质性会不断加大。当然,此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 五、政策建议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否应坚守合作制的讨论曾从上世纪的农信社改革持续至今,仍尚无定论。本文并不想卷入以上争论的“旋涡”中,但是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社会变迁引起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员异质性,使得组织“民主治理”模式难以实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为少数人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获利的“杠杆工具”,从而真正的合作也将不再可能,但本文并不涉及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此类演变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本身要涉及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产生、演变是否提高了社员福利

① 所谓的“互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贷款人基于获取借款人其他利益而愿意让渡部分贷款收益。然而,当贷款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于借款人时,贷款人的贷款决策可能不再考虑从借款人获取利益的情况,此时贷款人制定贷款决策时也会变得“经济理性”。

及福利分配等问题,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依据本文研究结论,相关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应明确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金融政策。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需要坚守合作制的地区,贯彻“民主治理模式”不仅仅需要制定合作金融章程,加大监管力度,更多的是应该着眼于如何缩小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间的异质性,为此,一是要增大普通社员所拥有要素的稀缺性。具体措施可以采用诸如财政补贴以提高普通社员股金比例;规范基层选举程序,保证政治选举的公平公正,消除贿选现象,以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同时,促进普通社员间的“合作”,使其退出所拥有要素的“合作性”增强。二是减小核心社员所拥有要素的稀缺性。为此,成立互助社的审批过程要严防部分农村精英利用其“特殊地位”实现对组织关键性资本的掌控等;限制具有紧密关系的核心社员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分散核心社员之间的“合作”性,减弱核心社员集体行动的一致性。

而在无需坚守合作制的地区,相关金融政策应该放弃旨在实现经典合作模式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示范章程》,解除限制其经营的“无效束缚”,允许其谋求自我演变、自我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张贵乐,于左.合作金融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 [2] 贺力平.合作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管理世界,2002(1):48-57.
- [3]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1-13.
- [4] 易棉阳,陈俭.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路径与制度反思[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2):78-87.

- [5] 张元红,李静,张军.从合作基金会事件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2(8):10-19.
- [6] 史建平,周素彦.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理论、绩效与出路[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21-26.
- [7] 谢平,徐忠,沈明高.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评价[J].金融研究,2006(1):23-39.
- [8] 张杰,高晓红.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社改革[J].金融研究,2006(3):48-56. Alchian, A. and H.
- [9] 彭春凝,苟正金.论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制度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108-111.
- [10] 彭克强.农村合作金融增量渐进发展论——对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一种新的认知尝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40-46.
- [11] 李晓佳.发展经济体中的合会金融——台湾的经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23-24.
- [12] 王松,叶海平.我国合会的制度障碍与排解[J].前沿,2011(7):145-147.
- [13] 陈东平,周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内部治理机制缘何“异化”?——社员合作博弈的视角与来自浙南M镇的证据[J].江苏社会科学,2012(2):62-67.
- [14] 林坚,黄胜忠.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12-17.
- [15] 黄桂田,李正全.要素间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与企业产权演进逻辑[J].经济科学,2003(5):14-23.
- [16]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 [17] 谭同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村田野经验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8):114-129.
- [18]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9-121.

(责任编辑:宋雪飞)

## Members' Heterogeneity and the Non-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Rural Cooperative Fund Organization: In the Case of North Jiangsu Areas

CHEN Dongping, REN Pengx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mutual fund organization—a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has deviated from the democratic mode advocated by cooperative finance. The past experience of rural financial reform provoked our medication over why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 of China's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often failed. Supported by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d the reason of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bers' heterogeneity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36 rural mutual fund organizations of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rease of members' heterogeneity causes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deviate from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d the members' heterogeneity and the current rural social change, revealing that the rural social change generating the members' heterogeneity is the root of the deviation of the rural mutual fund organiza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policy making should take the correct direction with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aken.

**Key words:** Extension Service; Factor Input; Labor Capital; Rice Produc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上接第 44 页)

## The Impacts of Derived Variety System in UPOV on China's Agricultur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New Rice Varieties

TANG Li<sup>1</sup>, BIAN Qijuan<sup>1</sup>, ZHAN Jintao<sup>2</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46,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rice varieties, this article employed pedigree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derived varieties developmen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ult and Conclusion: The spillover of original varieties promote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growth. The derived varieties did not negatively affect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he abundant use of original varieties was confined to a small number of cultivars or breeding materials. The spillover channel of original innovation occurred mainly between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and from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nterprises, but only rarely from enterprises to external bodies—the enhanced commercial breeding abil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rived Variety; Original Variety; Spillover